



武廷选：热血赴正义 浩气永留存

武廷选(1903—1935)，字弼丞，固原市原州区人。幼年好学上进，在固原县城第一高等小学(提署街小学)读书，随后考入平凉中学。在校期间学习成绩排名靠前，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他积极主张同学剪掉长辫子。一次，他看到老乡马应斋留着长辫，说：“社会变了，你还留着长辫干什么？”说着就动手剪掉了马同学的长辫。他勤奋好学，刻苦读书，乐于助人，圆满完成了学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平凉柳湖师范学校。他积极参加各种先进活动，接受进步思想，在学校里还受到马列主义思想的熏陶，很快成长为一名进步青年。

毕业后，当时有一个本县黑城乡名叫祁三的人，在酒泉任观察，他即投靠于其，后因志向不同返回家乡。民国十八年家乡大旱，民生疾苦，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匪盗横行。土匪王富德一伙窜扰七营一带，抢去乡亲们耕畜10余头，他得知后非常气愤，不顾家人的反对，只身入匪部，争辩索回了被抢

的耕畜。民国二十年(1931)入陕西杨虎城将军部，任陇东靖绥司令部文书。武廷选年轻有为，会干事，有能力，刚正不阿，办事公正。在那个年代，盐务是个非常重要的行当，本地食盐大都靠骆驼从中卫运来，盐商被抢事件时有发生，加之私盐泛滥，老百姓食用后患大脖子病非常严重，影响生产生活，于是在民国二十二年，回到固原担任盐务局主任。

他上任后，首先对本地的盐业经营、运输私盐等情况进行了了解、整顿，重新制定新的规章制度。还明确规定盐警不能随意打骂，更不能敲诈盐商，盐商要照章纳税。很快盐业经营状况明显好转，税收也足额上缴，市场秩序稳定，受到盐商及运输户的拥护。时任固原县长的贵州人胡福同，也主动和武廷选接近，并多次以种种名义要钱，都被武廷选拒绝，胡福同怀恨在心。

胡福同名义上“清正廉明”，而在背地里却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经常对一些生意人进行敲诈，动辄

抓进大牢。一次，在县衙以“德政”为名搞大典，以庆祝自己当县长“清正廉明”，历时10天，搭台唱戏，大摆宴席。城乡士绅都携带厚重礼物“恭贺”县长。逢年过节各方人士都要向县太爷送礼，胡福同多次派人将银钱用标有“亚西亚”字样的油桶包装，藏人盐包内偷偷外运。一次，被武廷选发现，全部扣留，胡福同非常痛恨武廷选。

胡福同一伙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他们欺负良家妇女，霸占民妇，武廷选在一些公众场合给予揭露。一天，他将胡福同的丑闻以漫画形式张贴在大街上，公之于众，他还积极主张回汉平等、男女平等，主动为老百姓办好事，百姓有困难他都求必应。一次，平凉驻军捕去固原民主人士祁九卿，武廷选多次前往营救，最终被救出狱。

民国二十三年八月九日，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在兰州召开各县、县会议。会议结束后，在兰老乡设宴招待固原同乡，武廷选也应邀参加。席间，武廷选当众怒斥胡福同：

“请县长高抬贵手，莫把老百姓白花花银子运走，这是固原人民的血汗啊！”将胡福同闹得十分尴尬，一时不知所措，未等宴席结束就溜走了，在场的同乡无不拍手称快。一时，街谈巷议，人心大快。武廷选还经常利用一些机会宣传先进思想，主动向民主人士接近，在当地和有着很大影响。他的进步思想和举动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猜忌，胡福同恨在心，预谋除掉他。民国二十四年(1935)除夕，一位地方人士被胡福同设陷阱入狱，武廷选听到后心急如焚，不顾个人安危，来到县衙面见胡福同，言辞激烈。不料，被胡福同以扰乱社会治安、共产党分子等罪名将其扣押。时至年关，胡福同密电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是胡福同的亲友)，遂以武廷选是共产党的奸细、挑拨民族团结、扰乱社会治安等罪名有罪决定将其处决。

1935年农历正月初一(2月4日)凌晨，武廷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据固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抗日救国活动。(资料图片)

红军西征途经宁夏地区，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以实际行动宣传了各民族平等与团结的政策，有力反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实之词，为争取民心、壮大革命力量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制定民族政策 推行民族平等 民族自治

西征以来，针对西征红军即将进入甘肃、宁夏回族聚居区的现实，1936年5月24日，红军总政治部颁布《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要求红军指战员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团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苛捐杂税，帮助组织抗日军队和建立自治政权等。

5月2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签发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宣言》对回族人民长期遭受的压迫剥削表示深切的同情，指出“回民在千余年以来，历受中国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特别是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统治之下的苛捐杂税，使回民的生活，陷于艰难困苦不能生存的地位”，号召回族人民“当此紧急存亡的关头，望即奋起”！《宣言》重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以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及其他弱小民族为基本任务。《宣言》提出，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建立自治的政府，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各民族亲密联合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联合土耳其、外蒙古、苏联及其他同情中国的各民族、彻底解放的民族与国家共同抗日。

《指示》和《宣言》这两个文件从红军和苏维埃人民政府的角度、从对内(党和红军)和对外(国家、社会和劳苦大众)两个维度出发，对党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全面阐述，成为红军在宁夏开展民族宗教工作的纲领和指针。

培养干部 发展党员

1936年8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西方野战军发布《关于西征地方工作总结的训令》，强调“为了开展回民工作，在组织上应大量的培养回民干部”。10月17日，毛泽东、杨尚昆在关于征求对回民问题决定的意见给朱德等人的电文中指出，吸收回民解放大会中的良好分子加入共产党，“回民武装为回民抗日军及抗日游击队，回民队伍中应有党的组织，并注意培养回民干部”。西征红军在下马关开办了回民干部训练班，并派几十名回民干部到陕甘宁省政府所在地洪德河连湾进行学习。这一期间，还特别注重吸收回族中的先进分子入党。1936年6月，毛泽东等在《关于回民工作给一、十五军团的指示》中提出，要“吸收个别觉悟分子入党”。

通过培养，一批回族中的先进分子脱颖而出，如回民干部马和福，在党组织的帮助和关怀下，他的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3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当选为豫旺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成为豫旺地区表现最出色的优秀回民干部。10月20日，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马和福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后，马和福发动各区乡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做熟食、烙干粮，支援红军主力，并带领当地群众粉刷墙壁、书写宣传标语，还常常利用农村集市对回民群众宣传当时的形势和任务。

1937年2月底，马和福被捕，马鸿逵多次派人对其软硬兼施，并亲自审讯，动用酷刑，均一无所获。在被囚宁夏城期间，马和福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他说：“我从参加共产党那一天起就做好一切准备，随时都为党和人民献出自己的生命，你们想怎样便便”，“共产党是解放劳苦大众的，加入共产党是我的追求，请你们不要在我身上下功夫……我绝不会和你们走在一条道上。”1937年4月3日，马和福壮烈牺牲，年仅45岁。

建立武装力量 团结一致抗日救国

为了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张“武装回民群众”。《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就提出成立武装军队和游击队，在《对回民人民的宣言》中也强调，联合回民中自己的一切武装力量，希望将来能成为抗日联军的主要力量之一。

西征红军解放的民族聚居区，都纷纷建立起地方武装。红一军团组建了回民连。8月下旬，回民连官兵随部队到达西吉，常常三五个人一组，到当地回民群众家中宣传红军进行革命的目的和党的民族政策。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不少回民青年参加了红军，回民连很快就由40多人发展到近200人。在当时的回民武装力量中，最著名的就是回民独立师。1936年5月下旬，回民独立师组建，由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回民干部马青年担任师长。

回民独立师成立后，即投入激烈的战斗，相继参加了围攻小桥畔、安边、定边、盐池、豫旺、王家团庄、下马关、红城水等战斗。在下马关战斗中，回民独立师对敌军展开政治攻势，向守城的敌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民族政策。在红城水战斗中，回民独立师和红七十三师一部，在北塬果园子里与敌军展开激战，击毙和俘虏敌军200余人，沉重打击了敌人。在军事斗争的同时，回民独立师还以王家团庄和半个城为中心，活动在大小罗山、韦州、高崖、关桥堡一带，开展剿匪反霸斗争，发动群众参加革命。回民独立师是我军历史上建立的第一支回民武装力量，也是西征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结果。

尊重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把保障回族的“风俗和信仰”看作是“争取回民的良好先决条件”。6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在《关于回民工作给一、十五军团的指示》，阐述了中央关于回民工作的基本原则，重申了对回民工作的“三大禁令”“四大注意”。

到达豫旺地区后，为做好回民群众的发动工作，各部队除学习中中央和西征红军总政治部的有关指示外，还制定了许多具体的纪律和守则，给各部队印发了《回民工作守则》，制定了红军在回民地区必须遵守的具体细则，红军各部队均能严格执行规定。

这些政策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回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有较为深切的了解，体现了对广大回民的理解和尊重，反映了党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重视程度。(据人民网、湖北党史网、《共产党人》)

关城堡会议旧址

关城堡会议旧址，位于中卫市海原县城东北部30公里处的关桥乡关桥村。关桥堡东南临贺堡河，北濒麻春河，呈三角形。会议旧址位于关桥村东台地上，为四合院中式建筑，始建于元代，1958年“破四旧”时拆毁。旧址上修建华润希望小镇大楼，楼前尚存有红军使用过的一口水井。

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毛泽东于13日致电彭德怀，要求“按照十月作战纲领准备，作出宁夏战役计划纲要，与朱、张面商后提出于军委。”据此，朱德、张国焘于23日到达打拉池，与彭德怀、徐海东等西方野战军领导会商，商讨宁夏战役计划。

正当此时，战局发生重大变化。10月2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王均、关麟征、毛炳文等部，由朱绍良指挥，以近30万人的优势兵力向红军大举进攻，并令东北军王以哲部及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部协同中央军作战。蒋介石还亲临西安督战，企图将红军消灭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境内。

10月25日，中革军委领导致电红军总部及三个方面军领导人，指

出红军应先击破南敌，再集中向北，并决定先以三个方面军主力进行海打战役，击破南敌，停止敌人追击。同时，为了给下一步向北攻取宁夏创造条件，决定红四方面军以大部分兵力参加海打战役，并以两个军西渡黄河，尔后转向宁夏之中卫、定远营行动。

按照海打战役部署，红四方面军未渡河之四军、三十一军正面阻击尾追红军之王均第三军，红一方面军从侧后进攻，将其消灭在打拉池一带。但是，张国焘当面表示同意，背后却密令四军、三十一军撤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位置，致使红军主力右翼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海打战役计划未能实现。

会上，张浩宣布中央命令：第一是正式任命彭德怀为红军前敌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第二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对红军进行统一指挥；第三是会议决定实施“关城堡歼敌计划”，以寻歼歼灭尾追的敌先头部队。除渡河部队外，红一方面军、红三十一军、红四军、红二方面军由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此次会议史称“关城堡会商”。

11月3日，彭德怀发布了关于消灭胡宗南部先头部队两个师的战斗命令，要求三个方面军做好战斗准备，引敌深入至关城堡地区，一举消灭。4日，彭德怀又发布了《我军打击王、孔两敌东进部署》，通告敌情，调整3日的部署，要求各部队隐蔽并加强侦察，做好在关城堡歼敌的准备。红军各部队先后到达预定作战地域，后因我军埋伏在驼厂堡附近的右翼(四军、三十一军)行动企图暴露，敌人不再进攻，而就

构筑工事，同我军对峙。因之，关城堡歼敌计划未能实现。

红军进驻关城堡后，面临的巨大困难是生活用水。当时，关城堡有一口井，但水量不大，群众用水十分困难，都要到贺堡河里挑水。由于贺堡河水是咸的，人喝了会拉肚子。为了解决军民用水困难，彭德怀司令员命令战士们设法寻找水源。战士们在村子东南一口废弃多年的老井里掏挖出了清澈甘甜的井水。通过修缮，老井水成了村里的主要水源。红军走后，乡亲们为了纪念对红军的深情厚谊，将老井命名为“红军井”。直到2015年，“红军井”才“光荣退休”，并被保护起来，成为红色遗址。

关城堡会议是中共党史和军史上一次重要会议，解决了红军三大主力统一指挥的问题，为后续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关城堡会议旧址也成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这里追寻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凝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宁夏磅礴伟力。(据《共产党人》、红色基因传承网)

铜手炉与毛泽民在盐池的红色岁月



陈列在宁夏博物馆的铜手炉。(资料图片)

毛泽民，字润莲，1896年出生的他比哥哥毛泽东小3岁。由于哥哥17岁就走出韶山冲求学问道和从事革命活动，且弟弟毛泽东还是5岁孩童，协助父亲经营米店以及打理田间地头的事就落在了次子毛泽民的身上。

从小，毛泽民就表现出超强的理财能力，勤俭节约、精打细算。1919年10月和1920年1月，母亲和父亲相继撒手人寰，为哥哥提供生活费、支撑他开展革命活动，以及保障弟弟在长沙读书的重担让毛泽民不得不学会如何撑起一个家。

1921年初春，毛泽民从长沙回到韶山，教育全家干革命。哥哥对毛泽民说：“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小家，只顾自己有饭吃，要使全国人民都有饭吃。怎么才能办得到呢？就是走出去，干革命，这叫‘舍小家，为大家’。”

听了哥哥的教诲，这一年春节过后，毛泽民来到省会长沙，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担任校

务，负责管理全校师生的伙食。他工作努力，管理有方，时时处处为他着想。学生的膳杂费，学校原规定每学期一次交清，许多穷学生因此而辍学。毛泽民和主事商量后，改为分期交纳，减轻了学生负担，受到了大家的赞扬。

在其后的革命生涯中，毛泽民与哥哥和弟弟不同，不是拿着枪带着队伍闹革命，而是拿着算盘账本赚取经费支持革命事业，先后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经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行长，红一方面军十五大队、长征先遣工作团负责人，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新疆省财政厅厅长、民政厅厅长等职。在筹集党的活动经费、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保障红军供给和建设抗日大后方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6年6月21日，西征红军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解放了宁夏盐池。刚解放的盐池，由于战争和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百姓一时不了解党的政策，许多工匠、商贩停工，商铺关门，经济十分萧条。铜板不能使用，法币又没有，苏维埃货币群众还不相信，这些棘手的问题都需要中央的帮助和指导。

1936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带领工矿科长高登榜、会计科长钱希均(毛泽民夫人)等人，赶到了刚解放的盐池开展恢复经济工作。一连几个月，毛泽民每天骑着马到各区、乡考

察指导，不能按时吃饭，看到这种情况，盐池县来的同志专门送给他一只铜手炉。铜手炉又称“袖炉”“手熏”“火笼”，是旧时宫廷乃至民间普遍使用的掌中取暖工具。这只铜手炉由红铜制成，为长方形，长16厘米，宽12.5厘米，高7厘米，有一个长28厘米的提手，盖子中间有个一圆形“寿”字装饰，盖子其他部位则全部为镂空花格图案。它不仅可以暖手，还可以随时加热干粮喝到热水，毛泽民感慨地说：“在南方很少见到这种东西，如果在红军长征翻越雪山时有这样的铜手炉，就可以挽救许多红军指战员的生命。”

西北这片荒凉却又孕育着希望的黄土大地，给了毛泽民施展经济才华的大舞台。进城不久，他就指示革命委员会把没收的“聚和兴”和“万兴”和“两家豪绅的货物集中起来，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城市消费合作社。

为了宣传建立消费合作社的意义、性质、目的和管理办法，毛泽民在7月4日(农历五月十六日)的群众大会上进行了生动的讲演：“消费合作社不是政府开的商店，也不是几个有钱人合伙开办的以赚钱为目的的商店，它是广大群众的集体的经济贸易组织。过去我们向商人买货物，他们不但数量不足，而且价钱又高，一年不知吃多少亏；我们卖出剩余产品时，他们压价很低，一转头又赚去好多钱，我们要抵制商人这种过分的剥削，节省支出，增加收入，把过去一向依靠商人替我们买卖的事情，拿过来自己做。办合作社，人少、资本小，

固然办不成，人众钱多没有组织也不行，所以我们要组织起来，大家拿出股本，选出几个我们信任而善于做生意的去管理、去经营，专门替我们大家办好福利事情，赚了钱依照规定，还可按股分红，我们开办这样一个商店就叫它‘消费合作社’，为了办好合作社，大家要多入股金，人多力量大，资本雄厚，才能给我们多办好事，合作社才能有力量担当起这一重大任务。”通过建立消费合作社，毛泽民大力组织当地土特产品运向外地换回根据地军民所需要的粮食、布匹、医药等急需物品，为缓解盐池的经济压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同时，长期的经济工作，使得毛泽民练就了一双发掘财源的慧眼。他了解到在陕北与宁夏、内蒙古交界地带的食盐资源非常丰富，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积极开展定边和盐池盐业的经济计划。他组织成立了盐务局，还把国民党规定的非常苛刻的盐税相对调低，为盐池经济恢复打下了良好基础。

12月，毛泽民、钱希均夫妇离开盐池时，将铜手炉还给盐池县委。宁夏博物馆成立后，回汉支政委梁大均将这件珍贵的铜手炉捐赠给宁夏博物馆。

这件铜手炉，承载着毛泽民夫妇组织盐池人民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实干精神和革命品格，他们团结发动人民群众，艰苦奋斗，使盐池经济很快得到了良好发展，更为陕北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据《中国旅游报》、国家文物局网)